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牛津 政治行为研究手册 (下)

[美] 罗伯特·E.戈定 主编

[美] 拉塞尔·J.达尔顿 [德] 汉斯—迪尔特·克林格曼 编

王浦劬 主译



人民出版社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

(下)

[美] 罗伯特·E.戈定 主编

[美] 拉塞尔·J.达尔顿 [德] 汉斯—迪尔特·克林格曼 编

王浦劬 主译

责任编辑:忽晓萌

封面设计:汪莹

责任校对:张红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美)罗伯特·E.戈定 主编;(美)拉塞尔·J.达尔顿,
(德)汉斯—迪尔特·克林格曼 编;王浦劬 主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01-019648-0

I. ①牛… II. ①罗…②拉…③汉…④王… III. ①政治—行为—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0685 号

书名原文: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01-2017-3924

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

NIUJIN ZHENGZHI XINGWEI YANJIU SHOUCHE

[美]罗伯特·E.戈定 主编 [美]拉塞尔·J.达尔顿 [德]汉斯—迪尔特·克林格曼 编
王浦劬 主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58.75

字数:1109 千字

ISBN 978-7-01-019648-0 定价:128.00 元(上、下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下)

第五部分

政治行为新论辩

第二十三章 政治选择的制度理论诠释·····	407
1. 行为经济学模型·····	408
2. 政治选择集的性质·····	409
3. 选择的数量·····	409
4. 选择的极化·····	411
5. 选择标签和政治信号·····	412
6. 制度与理性预期·····	416
7. 政党与政治推理·····	417
8. 总结·····	419
第二十四章 社会阶级的衰退?·····	426
1. 阶级分析、阶级分化和政治行为·····	426
2. 阶级投票研究的三个阶段·····	427
3. 阶级投票研究的新世代?·····	428
4. 阶级架构模型·····	429
5. 阶级投票的测量·····	430
6. 有关服务阶级政治倾向的争论·····	431
7. 有关阶级投票的持续性或者投票衰退的争论·····	432

8. 阶级投票的趋势	433
9. 阶级投票变化的理论解释	438
10. 比较分析阶级投票变化的原因	440
11. 总结	441
第二十五章 宗教与虔诚对投票行为影响	448
1. 世俗化理论	450
2. “供给方”理论	454
3. 政治中的宗教	455
4. 世俗化还是非世俗化?	458
5. 现代化还是多样性?	458
6. 投票箱中的宗教	460
7. 总结	464
第二十六章 种族和政治行为	468
1. 政治行为与选举参与	469
2. 种族冲突和政治行为	472
3. 探究与理解的行为框架	474
4. 比较政治、种族和政治行为	476
第二十七章 投票的经济模型	480
1. 研究筛选	481
2. 研究最多的案例:美国、英国和法国	482
3. 民主政体的比较:跨国研究	488
4. 总结和结论	490
第二十八章 政治分裂的新维度	499
1. 政治分裂:新词换旧貌?	499
2. 政治分裂的新分类?	500
3. 政治分裂的新范围?	502
4. 政治分裂的新阐释	510
5. 政治分裂的新影响?	512
第二十九章 党派认同感的再思考	517
1. 何为政党认同感?	518
2. 变化中的政党认同感	520

3. 政党认同如何变化?	521
4. 政党认同的变化原因	522
5. 新兴民主政体的证据	524
6. 未来的研究方向	525
第三十章 政治人格化	530
1. 领导人和民主政体	531
2. 制度与政治领导力	534
3. 电子媒体与政治人格化	536
4. 电视与“政治启动”	538
5. 政党衰落和选举参与	540
6. 影响	541
第三十一章 政治结构和选民行为的相互作用	548
1. 政治结构与政治行为的比较研究:情景中的公民	548
2. 政治结构和行为建模	550
3. 政治结构对选民行为的影响:概念问题及方法论问题	552
4. 经济投票研究中政治结构与选民行为的相互作用	555
5. 合法性研究中投票选择和政治结构的相互作用:因果倒置	558
6. 多层次模型及多层次治理:公民与欧盟	559
7. 讨论	560
第三十二章 不同研究视角下的选举行为	567

第六部分

政治参与

第三十三章 选举投票率	577
1. 选举模式和趋势	578
2. 各国投票率存在差异的原因	581

3. 近期投票率下降的原因	584
4. 是否投票的抉择	586
5. 结论	589
第三十四章 政治主动性与政党成员	592
1. 作为会员组织的政党	592
2. 党员研究	596
3. 党员及其纽带:党员代表性如何?	597
4. 党内参与和民主进程	600
5. 政党成员与政治参与:数量下降,但没有过时?	605
第三十五章 社会资本	609
1. 社会资本的根源和概念	609
2. 社会资本的影响	612
3. 关于社会资本下降的讨论	613
4. 社会资本的来源	617
5. 结论	622
第三十六章 市民社会与民主化	628
1. 市民社会的概念化	629
2. 市民社会的功能	632
3. 民主化	633
4. 民主国家的过渡及市民社会的出现	634
5. 市民社会和民族主义	638
6. 政治文化和市民社会质量	639
第三十七章 社会运动	644
1. 关于社会运动的理论观点	646
2. 当前挑战	650
3. 社会运动在政治学中的地位	654
第三十八章 抗争政治的传播	658
1. 抗争政治的观点及理论	659
2. 抗争政治的传播:实证发现	661
3. 结论	668
第三十九章 新女权主义对政治参与研究的挑战	673

1. 分支学科的发展	673
2. 能动性鸿沟的难题	676
3. 竞争性知识主题与解释框架	678
4. 供方因素:文化态度与公民资源	680
5. 需方因素:动员机构与性别化制度	682
6. 结论	685
第四十章 竞选新模式	691
1. “美式”选举工程学	692
2. 在美国市场“购物”	695
3. 竞选重要吗?	699
4. 有效竞选的前提条件	703
5. 小结	704
第四十一章 电子政务与民主	711
1. 网络民主的根源	713
2. 现实世界经验	715
3. 电子政务的优势与风险	722
第四十二章 不同研究视角下的政治参与	729
1. 我们学到了什么?	730
2. 政治参与:成就与展望	736
3. 结论	740

第七部分

关乎民意

第四十三章 民意与政策的关系	745
1. 民意代表的理论与实践	746
2. 代表的机制	751
3. 问题与代表	752

4. 制度与代表	754
5. 政治平等	756
6. 公众回应的重要性	757
第四十四章 政治精英	765
1. 政治精英理论之辩	767
2. 当代世界政治精英的本质	768
3. 政治精英的作用	773
4. 结论	775
第四十五章 政治代表与民主	779
1. 政治代表的规范与模式	780
2. 制度与政治代表	782
3. 代表谁:代表的关注点	784
4. 如何代表:代表的模式	785
5. 议题契合性与政策表达	787
6. 结论	791
第四十六章 人民代表研究:询问正确问题并获得正确答案	796
1. 规范与实证	796
2. 证据	797
3. 系统	802
4. 转换分析角度	806



政治行为比较研究方法论

第四十七章 政治行为比较的研究资源	811
1. 跨国调查研究项目	811
2. 实现调查可及性:主要档案库的作用	833
3. 结论	836

第四十八章 比较民意调查	840
1. 为什么要进行民意比较研究?	840
2. 比较调查存在的问题	842
3. 克服存在的问题	843
4. 多数国家还是少数国家?	846
5. 对国家数据的需求	847
6. 比较调查数据的分析	848
7. 结论	849
第四十九章 精英研究方法	853
1. 精英研究的范围	854
2. 精英理念的操作化;精英识别方法	855
3. 数据收集的方法	858
4. 结论	866
人名及专业术语表	870

英文：政治选择理论：制度理论诠释

作者：李俊成（Jing Cheng Li）



第五部分

政治行为新论辩

保罗·M.斯奈德曼(Paul M.Sniderman)

马修·S.莱文达斯基(Matthew S.Levendusky)

为什么选民会选择一位候选人而抛弃另一位呢?为什么公民会选择这项政策而弃置另一项呢?答案主要有两个——理性选择和心理因素。这二者一直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而本文却从政治选择的制度理论视角将它们合二为一(Adams, Merrill, and Grofman 2005; Bendor, Diermeier, and Ting 2003; Bendor, Kumar, and Siegel 2005; Sniderman 2000; Jackman and Sniderman 2002; Sniderman and Bullock 2004)。本章将以宣传和发展这一创新研究为主要目的。该理论流派众多,有些是形式理论层面,有些则更侧重心理方面。^①但其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关注政治制度在建构政治选择时的作用。

【438】

这就是直觉的关键。在政治中,公民并不是随意地选择,而是在一个系统的列表中进行选择。因此,政治选择理论需要两种解释机制——一种是关于人们做出选择的内部机制,一种则是政府提供这些选项的外部机制。政治行为研究一直关注前者,而正式理论关注后者。本文提出了一种理论框架,力求将内外部的解释机制融合起来。

许多前辈为寻求宽泛的策略,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建构选择的外部因素上。比如,库克林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对信息环境的研究(Kuklinski et al. 2001; Jerit, Barabas and Bolsen 2006),德鲁克曼关注框架设计(2004, 2001a, 2001b; Druckman and Nelson 2003),萨里斯(Saris 2004)关注任务的结构。所有这些都是强调影响实际选择的条件。但是,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设定问题。目前最需要的是将两个目的加以整合,一方面使它能够解释公民选择的形成原因,比如,为什么政治选择构成的方式是这样的,而非其

① 术语是具有欺骗性的。政治行为研究采用的是行为路径,即关注解释的工作,而非解释的内容。“心理”一词更加贴切。本文采用的行为研究路径是正式方法和心理视角的结合。

他类型?另一方面,它也能解释为何选择的外部组织和内部进程得以调和,究竟外部因素与内部模式协调一致的原因为何。基于以上内容,我们提出了政治选择的制度理论。

众所周知,制度是非常庞大的帐篷式结构(tent construct),我们所关心的政党间的选举竞争的逻辑,不过是政治制度的冰山一角。政治选择的制度理论仍需继续完善,我们相信未来的研究前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提出一种通用的解释机制,即从政党的角度理解影响外部组织提供选择与进行抉择的原因。第二,这会有效解释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疑问:公民是怎样仅凭有限的信息储备和计算能力,做出连续的政治选择的呢?

1. 行为经济学模型

这种“墙头草”式(leg-in-both-camps)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很尴尬,甚至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理性选择用于解释理智情况下的选择,而行为方法用于解释非理智情况下的选择(Camerer, Loewenstein, and Rabin 2004)。虽然有些尴尬,却并未产生矛盾。行为

【439】经济学模型使理性与心理的结合成为可能。

行为经济学由三个前提构成。第一个是参与者致力于福利最大化。第二个是参与者拥有有限的计算能力和注意力。第三个前提是参与者希望他人的行动和愿望是稳定的(Kreps 2004)。这三个前提——效用最大化、有限理性、信念和喜好的内生性——构成了行为经济学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发现并分析理性选择的系统性偏离(Camerer 2003);通过观察实际选择与理性选择间的偏差程度,对此差异的原则进行解释可使行为研究的途径增值。

因此,虽然与行为经济学起点不同,政治选择也是如此。经济学假设认为,(总体来说)人们必须要做出理性的选择,否则就会陷入困境。而政治行为研究的假设刚好相反。观察参与者的错误行为比正确行为反而更为容易。毕竟在一般情况下,普通公民对政治既不关心,也不了解(e.g. 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6)。他们如何做出连续的选择,我们也无从得知^①,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公民究竟能否做出合理的选择(Bartels 2003)?

许多人认为,若想使连贯的选择与沉重的民主公民身份兼容,简直是妄想。从有利的角度来看,传统上对政治行为的研究必须要选边站,由此导致研究连续选择非常棘

^① 连贯的选择是指公民在一系列政策方案中做出与自己物质观一致的选择。这是赫维茨与佩弗利(Hurwicz and Peffley 1987)作出的狭义解释。

手,它们假设公民是基于已有的资源形成偏好。因此从双方的立场出发十分必要。选择并不仅仅涉及选择者,还需根据选择集(choice set)的性质(McFadden 1974)做出。公民做出连贯选择的程度取决于政治制度,尤其是政党,视其能否担起组织连贯选择集的重任。

2. 政治选择集的性质

比较政治学的学生经常表示,他们从美国政治中学到很多先进的思想。这些学生阐明了选举制度的根本作用,并唤起了人们对政治选择制度构建的重视(e.g. Cox [440] 1997)。尽管我们的关注点是近端而非远端的,但是它强调的不是政治体系的结构,而是政党制度产生的政治选择集。^①

在政治选择集的所有性质中,被研究得最为细致的是政党(候选人)在投票立体模型中的政策立场(Downs 1957)。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模型构建者对唐斯假设的逻辑内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及其他发挥作用的因素,比如第三方的加入(Palfrey 1984)、潜在党内积极分子的参与决定(Aldrich 1983)、选民和候选人对彼此政策立场的不确定性(e.g. Wittman 1983; Palfrey 1984; Calvert 1985; Romer 2001; for an excellent overview see Grofman 200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个关于基本认同的问题刚刚被确定下来。菲奥里纳(Fiorina 2005)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候选人在政策空间的变动也反映出选民的变化。假设候选人是两极分化的,中间立场的选民只能在两位极端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虽然他们仍保持中立,却被认为是极端政策的支持者。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候选人随时间变化的空间立场,来分辨每个时间点影响选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因素(van Houweling and Sniderman 2004)。

我们还需要在特定政治制度背景中检验空间推理,但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政治选择集的非空间性质——数量、极性和选择标签。

3. 选择的数量

限制可供选择的数量对考察政治选择集来说是一个明智的策略。格拉泽(Glaser 2002)突破了传统研究内容,评估了可分离选择与捆绑选择的影响。研究的主题是支

① 克里西(Kriesi 2005)研究了瑞士的公民投票政治,但笔者在准备本文过程中没有及时发现这篇文章,因此没能充分利用该研究成果。该文用了目前最先进的诠释方法,分析政治精英如何构建选择集,并控制产生选择和实际做出选择的过程。

持或反对一项新的学校公债。一种实验情境是向参与者提供一揽子改进方案,由他们选择支持还是反对;另一种是提供改进方案的三个重点——暖气系统、电脑和体育馆,让投票者分别做出选择。当所有选择被捆绑在一起时,支持率并未超过60%。而当选择被分别呈现时,每一项的支持率都超过了60%。格拉泽的研究指出,选择结构的变化会影响政治结果。

【441】 作为一个一般命题,选择的连贯性应与选择的数量成反比:数量越多,选择与物质观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无法衡量多个选择需要花费的成本,但已有相当数量的辅助信息足以证明这一假设的合理性。

有关选择超载的研究已经陆续出现。^①例如,网店减少售卖商品的种类会增加销售业绩(Boatwright and Nunes 2001)。选择数量的多少可能会影响公民对个人选择的满意度(Iyengar and Lepper 2000; Iyengar, Huberman, and Jiang 2004)。增加选择的数量将会减少做出选择的可能性(Dhar 1997)。对于明确的政治选择,涅米和韦斯特霍尔姆(Niemi and Westholm 1984)发现与两党制的美国相比,在多党制之下,瑞典人政治立场的稳定性更高。戈登和赛古拉(Gordon and Segura 1997)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多党体系因其制度结构,使得政治的复杂程度更低。

虽然没有直接的描述,但有关信念体系一致性的经典文献中,对选择数量与选择一致性的关联有所涉及。在大众信仰体系中,“限制”是保持连贯性的重要方法。20世纪50年代,康弗斯(Converse 1964)在报告中写道,“限制”尚处于最低水平。但就在几年前,奈、韦巴和佩特罗西科(Nie, Verba, and Petrocik 1976)声称,“限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飞速增加。他们的解释是,和50年代相比,60年代的政治更加具有吸引力。在一项精准的实验中,苏利文、皮尔森和马尔库斯(Sullivan, Piereson, and Marcus 1978)表明限制水平的变化是源于引进了不同的问题形式——参与者需要在两项政策中进行选择,而不是针对一种政策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意见(Bishop, Tuchfarber and Oldendick 1978)。

对于这一方法的争论证实了政治选择集的性质,尤其多少选择数量才能尽可能地将大众政治倾向转换成一致的政策偏好。也许有人认为最佳数量是一,这样选民就不会受到第二个选项的干扰。但是苏利文(Sullivan)等人以及毕绍(Bishop)等人的研究表明,比起简单地支持或反对一项政策,选民在面对两个对立选择时,自身的立场与事件更容易保持一致。就好像经过对比,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发现什么更重要。关于有效性的深入观点仍处在探索的阶段。要想确定公民对政治问题的想法能否保持连贯,

① 感谢斯科特·尼克尔森(Scott Nicholson)介绍这篇研究文献。

就需要根据他们在现实政治中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问题。这听上去也许是老生常谈,但实则不然。与1964年之前相比,1964年之后的选择形式更适合竞争性的政党体系,1964年之后情况的变化给公民带来更多的限制。奇怪的是,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限制的【442】水平仍然很低,这是由于1964年之后的选择形式具有更强的外部效度,因此限制水平在1964年前后一样高,而不是同样低。

在大众信仰体系中,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是一致性的最高标准。“政治行动计划”(Political Action Project)(see Barnes et al. 1979)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以探索不同国家大众信仰体系中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福克斯和克林格曼(Fuchs and Klingemann 1989)对西德、荷兰和美国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美国人相比,西德和荷兰的民众能够更轻松地定义政治学意义中的左翼与右翼。“基于这些数据”,他们认为“与两个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左翼—右翼模式的制度化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Fuchs and Klingemann 1989, 209)。

这一发现可被视为公众舆论的特性之一,因此会影响到政党精英的政治策略。然而我们的意见刚好相反,它反而会使民意内生。公民能否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思考,取决于政治精英是否刺激他们这样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进行政治行动计划研究时,美国的党派政治在意识形态上不如西欧国家连贯。由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较少,美国公民需要进行更多的思考才能划分出左翼与右翼。现在的美国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更多的不同(Poole and Rosenthal 1997)。相应地,美国的信念体系应该在意识形态上更加一致,事实也的确如此(Layman and Carsey 2002; Levendusky 2006)。总的来说,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取决于政党精英在意识形态上两极化的程度,而不是相反。

4. 选择的极化

第一代有关政治选择的研究框架(e.g. Zaller 1992)表明,许多公民的意见可能从一边转向相反的另一边,这取决于制定的政策是想诱发支持,还是反对的情绪。难怪这种“摇摆不定”的结果被当作政治选择不连贯的证据,实际上它反映了人们对公共政策的重大事件缺乏真正的态度。但是斯奈德曼和赛里奥尔特(Sniderman and Theriault 2004)假设在选举竞争的压力下,政治选择集会呈现两极化:如果公民反对一项行动,就意味着他们得表现出对另一项的支持,反之亦然。因为以前的框架实验只会给参与者提供一种选择,斯奈德曼和赛里奥尔特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选项,使两种框架得以出现。【443】在只有一种框架的情况下,结果与前人相同:回答者先是偏向一边,进而又偏向另一边。